

Significance and Paradox of Misreading: A Study on problems of effects of Soviet-Russian culture influence on China*

Lin Jinghua*

Abstract

Soviet-Russia, as a supranational state with troubles,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enthusiasm, Chinese intelligentsia and political activists introduced and advocated Soviet-Russian culture, and therefore implemented it. After collapsing of Soviet-Russia, Chinese finally understood that Soviet-Russia influenced on China through its Slavic fascination. Why did intelligentsia unilaterally construct the comparability of Chinese and Soviet-Russian culture, and accept Soviet-Russian culture before realizing the complexity of Soviet-Russian culture? Only after reconsidering why and how Chinese intelligentsia misread Soviet-Russian culture, can we probe into the problems, such as how Chinese simplified the comprehension of Marxism, why they neglected th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process of reconstructing China, how the extension of "democracy" was lessened, and why Soviet-Russian culture was regard as universal truth, etc.

key words: misreading; Soviet-Russian democracy; National State; Soviet-Russian Marxism;
truth

* 本文 2006 年 9 月 12 日到稿，2007 年 3 月 29 日審查通過。

* Professor of the 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Poetry,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誤讀的意義與陷阱：蘇俄文化之于中國的諸種後果

林精華*

摘要

自民國以來，自身問題重重的蘇俄(如其歷史發展基本上是在不斷動盪中前行的、斯拉夫文明內部分化很嚴重、沒有統一的民族認同等)，卻經由中國知識界和思想界甚至政界的積極介紹、熱情宣導、制度性推行等，蘇俄文化對中國產生了神奇影響力。蘇聯的解體讓中國人突然醒悟到，俄國對 20 世紀以來的中國所發生的種種影響，本質上不是基於其生產力的先進，而是因其斯拉夫文明的獨特魅力。問題是，20 世紀中國在沒有搞清楚俄國文化複雜性的情形下，何以一廂情願地大規模引進俄國文化？因而今天我們有必要反思近百年來中國知識界對蘇俄文化的誤讀及其後果，探究經由蘇俄的仲介，中國把馬克思主義問題怎樣地簡化了、晚清帝國在轉化為現代民族國家過程中遭遇了什麼樣的認同障礙、「民主」發生了何種變異、蘇俄文化被普遍化到怎樣的程度等問題。

關鍵字：誤讀、蘇俄馬克思主義、蘇俄民主、民族國家認同、真理

* 作者係大陸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文學院、外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基於中俄文化相似性原則，現代中國所興起的長盛不衰的「俄國文學熱」，無論是要實現啓蒙主義的理想，還是要從俄國提取中國現代文學所需營養的具體目的，其實是附屬於一個更爲遠大的目標：爲重建中華民族而使之成爲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去尋求更有效的思想文化資源。這就意味著，不只是作家、文學青年、熱愛文學的讀者和譯者等人關心俄羅斯，關心俄國是現代中國社會普遍現象，而且遠不只是關心俄國的文學，來自蘇俄的文學理論和社會發展理論同樣有影響力，即使是對俄羅斯文學的熱愛主要不是因爲它的審美品質，而是因爲它蘊含了種種更爲現實的價值。瞿秋白在給《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北京新中國雜誌社 1920 年 7 月出版）所寫的〈序〉中如是說道，「俄羅斯文學的研究在中國卻已似極一時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國布爾什維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生出極大變動，掀天動地，使全世界思想都受它的影響。大家要追溯其遠因，考察其文化，所以不知不覺全世界的視線都集於俄國，都集於俄國的文學；而在中國這樣黑暗悲慘的社會裏，人都想在生活的現狀裏開闢一條新道路，聽著俄國舊社會崩潰的聲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動心。因此大家都要來討論研究俄國。於是，俄國文學就成了中國文學家的目標」¹。1920 年 8 月 22 日新民學會以「俄國事情亟待研究」爲由成立「俄羅斯研究會」，「以研究俄羅斯一切事情爲宗旨」，並決定發行《俄羅斯叢刊》、派人赴俄考察（第二年夏天真的派遣了第一批留學生），5 天後《大公報》發表署名蔭柏之文〈對於發起俄羅斯研究會的感想〉稱，「你要覺得現在的政治經濟社會的萬惡，方才知俄羅斯怎麼起了革命，方才知應當怎樣研究俄羅斯，方才知研究俄羅斯到精微處」。故，茅盾總結說「俄國文學研究，在當時革命知識份子中間成爲一種風氣」。而且，這種風氣很有價值：按陳獨秀之言，中國受外敵侵略八十餘年後才有自覺的民族運動，主觀上是「蘇俄十月革命觸動了中國青年學生及工人革命的情緒，並且立下了全世界各被壓迫的國家及各弱小民族共同反抗帝國主義之大本營」²。

無論如何要充分肯定，蘇俄新文學和經由日本或蘇俄仲介引進俄式馬克思主義，在相當程度上吻合現代中國呼喚「革命」的情勢，符合 18 世紀以來現代民族國家構建過程中發

¹ 《瞿秋白文集》（2），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 年，第 543-544 頁。

² 獨秀：《十月革命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載《嚮導》週報第 135 期（1925 年 11 月 7 日）。

生「革命」的普遍規律，也是 20 世紀初國際社會的主流趨勢之一。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聲言，「今日莊嚴燦爛之歐洲，何自而來乎？曰，革命之賜也。歐語所謂革命者，為革故更新之義，與中土所謂朝代鼎革，絕不相類；故自文藝復興以來，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有革命，倫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學藝術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興而進化。近代歐洲文明史，宜可謂之革命史」，中國政治革命不成功，「推其總因，乃在吾人疾視革命，不知其為開發文明之利器故」³。與這樣呼喚革命相一致，俄國革命又召喚了世界：20 世紀初無論俄國多麼貧窮、議會政治多麼亂，但俄國整個似乎神聖地遠離西方帝國主義，不管蘇俄理念是否烏托邦，卻充當了許多思想家、藝術家、尋求理想世界的政治激進主義者的重要燈塔（beacon），第三世界知識份子因為祖國飽受帝國主義帶來的巨大創傷而因此做出積極反應，甚至為蘇俄意識形態所誘惑（attracted），蘇俄就這樣在全球擴展他們知識份子的獨特遺產，並在後來大半個世紀連綿不斷的國際反西化和反資本主義潮流中扮演著不可缺少的角色⁴。而中國認同蘇俄的革命又是在馬列主義名義下進行的，「誤讀俄羅斯」問題也就因此不可避免：原本是地方性的蘇俄社會主義演變成了中國所確認的全球性至少是東方社會的理想模式，並依據蘇俄所提供的社會發展各方面情況培植中國所需要的種種理論。

馬克思主義問題被簡單化

首先，中國期望蘇俄提供的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真理。

按別爾嘉耶夫所論，蘇俄共產主義乃俄國的一種文化傳統，「在俄國傳統上，與孟什維克式馬克思主義相比，布爾什維克式馬克思主義要強大得多」⁵。也就是說，蘇俄馬克思主義並非德國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而是經由俄國文化傳統改造馬克思學說而成的列寧主義。

³ 《新青年》第 2 卷第 6 號(1917 年 2 月)。

⁴ Steven G. Marks, *How Russia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From art to Anti-Semitism, Ballet to Bolshevism* (俄國是如何塑造現代世界的).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4-5.

⁵ Н.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俄國共產主義的起源與思想). М.Наука, 1990, С.82

這並非妄言！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登陸成功，並非列寧個人及其布爾什維克黨短時間內成就的，而是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本土化過程：別林斯基曾讀過馬克思、恩格斯 1844 年發表於《德法年鑒》上的文章，在著名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藏書中有馬克思主義著作，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和第一套《普希金文集》主編安年科夫（Павел Анненков, 1813-1887）與馬克思建有個人聯繫，1869 年無政府主義者巴枯甯翻譯了《共產黨宣言》、1872 年俄國經濟學家丹尼爾遜（Николай Даниельсон, 1844-1918）翻譯《資本論》第一卷在彼得堡公開出版發行（第一次印刷了 3000 冊，在一個半月內就售出 900 冊），1882 年 1 月《共產黨宣言》出俄文第二版（馬克思恩格斯親自作序）。但是，這些人沒有一個是共產主義者！1883 年普列漢諾夫等五人馬克思主義小組在日內瓦成立了「勞動解放社」，系統翻譯和傳播《共產黨宣言》、《哲學的貧困》、《雇傭勞動與資本》和《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經典著作三十種，到 1895 年《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俄譯本出了第三版，普列漢諾夫本人還寫了《社會主義和政治鬥爭》、《論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與《我們的意見分歧》等經典著作，它們通過各種管道在俄國廣為傳播，列寧本人就深受其影響，而普列漢諾夫本人在社會民主黨分化後，因其堅定堅守馬克思主義經典學說，成為少數派，而被批評為孟什維克分子和始作俑者、正統馬克思主義（ортодоксальный марксизм）；馬克思恩格斯還直接關心俄國社會發展動態和馬克思主義著作在俄國發行的情況，著有《論俄國社會問題》（1875）、《〈共產黨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等。除了普列漢諾夫和列寧等職業革命家閱讀馬克思主義經典原著外，索洛維約夫、弗蘭克、別雷、盧那察爾斯基等一大批文學家和思想家也曾如此，甚至嚴肅信仰馬克思主義、象徵主義作家和詩人安德列·別雷自稱是「社會主義者」，1905 年事件後司徒盧威（П. Струве）、布林加科夫（С. Булгаков）和別爾嘉耶夫（Н. Бердяев）等人組成「合法馬克思主義」（легальный марксизм），他們放棄了對暴力革命主張的信仰，把馬克思學說改造為經濟唯物主義理論。這些現象值得認真研究：俄國是在接受德國文化中成長起來的，德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建構民族認同的行為，從 18 世紀末以來為俄國知識界所關注，隨著俄國資本主義改革所帶來的問題日趨突出，出現了接納馬克思主義的趨勢，且馬克思主義在俄國實踐化和本土化過程中伴有激進的傾向，而這種趨向在相當程度上是有歷史傳統為基礎的，從十二月黨人的革命、赫爾岑「俄羅斯社會主義」、

車爾尼雪夫斯基抵抗資本主義之論、巴枯寧無政府主義、托爾斯泰的宗教無政府主義論（否定國家的作用）等，發展到列寧主義和在托洛茨基、布哈林、史達林之爭中所形成的史達林主義，彼此之間確有思想和文化上的淵源關係⁶。對這樣的馬克思主義，曾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法國著名左翼作家紀德 1938 年感歎說，「三年來，我太沉溺於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到了蘇聯後，反而覺得是在異鄉異俗生活似的」⁷。

令人驚奇的是，現代中國對俄國馬克思主義這一複雜歷史過程是有所知的，田漢在著名的《詩人與勞動問題》（1920）中曾專門論及「布爾什維克究竟是什麼？」問題，「仔細的道理還沒有研究出來，道聽塗說，轉滋誤會。於今只介紹俄國社會運動之源流與布爾什維克之根本的特質」：《資本論》於中國同治 11 年已經譯成俄文，俄國社會主義運動擴展最為強勁是在 1880-90 年代，俄國最初馬克思派代表人物為普列漢諾夫（譯成「勃雷哈洛夫」），其先驅有車爾尼雪夫斯基所開創的「到民間去運動」、繼之乃「土地與自由」之結社（即虛無黨），虛無黨分裂激進派與溫和派之後，便有了激進派組建的社會革命黨（「農民黨，多數斯拉夫主義者」、溫和派靜心研究馬克思主義而成立「社會民主黨」（與工廠勞動者一氣，多屬西歐主義者），兩黨都脫去了虛無黨的色彩而要廢除君主專制、成就社會革命根本目的，但手段與主張不能相容，「社會革命黨（農民黨）尊重俄國米爾（村社）制度，視為社會主義的要素；社會民主黨（工廠勞動者黨）則蔑視此種保守主義，謂於現代為無用。革命黨主張土地之共有；民主黨主張土地之自由。革命黨革命進行之方法當采恐怖主義；民主黨則視為無損。兩黨齟齬同時誘起各黨內部之分裂。民主黨主張以稍和平的手段達其目的者則為普列漢諾夫派，主張以激烈手段急行政治的與社會的革命者則為列寧派（譯為「呂寧」），1903 年社會民主黨開第二次大會於斯德哥爾摩，列寧派遂以多數戰勝普列漢諾夫的

⁶ 關於俄國馬克思主義史，請參見：А.Д.Сухов, Идеи Маркса в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Сб. Карл Маркс и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М.ИФ РАН, 1999, С.302-310; Россий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ые и духовные аспекты.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ед. под М.Мчедлов и др., М.: Изда. Республик, 2001,С.174-178. А.Ф.Замалеев, учебник русской политологии, СПб:Изд.-торговый дом «Летний Сад», 2002, С.157-196

⁷ 安德列·紀德著、鄭超麟譯：《從蘇聯歸來。附：答客難》，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114 頁。

少數，於是就有了列寧的多數派（布爾什維克派）、普列漢諾夫的少數派（孟什維克），分裂原因在於孟什維克（固執議會政治）、布爾什維克主張「『勞動階級的執政權者』甚堅，不肯與第三階級議會政治相妥協」，「『布爾什維克的基礎特質就是勞動階級的執政權！』，最能表現此種特質者，莫如由布爾什維克之手所定《勞兵會全俄社會主義聯合共和國憲法》，此憲法主要條項是『一切權力屬此國之勞動者』」⁸。

但限於客觀情勢，中國進步知識界情感性地認同十月革命和勞農政權就是對共產主義理想之實踐，認為列寧主義乃馬克思主義的正常發展，由此發生：1922年3月初發生喀琅施塔德水兵事件，官兵們提出「自由貿易」、「開國會」和「無共產黨之蘇維埃」等要求，以反對軍事共產主義，可是瞿秋白卻認為這是因為「受資產階級思想之影響」的結果⁹。本來，「缺少了《馬賽曲》的歌聲或紅旗的形象，要想像二月革命是不可能的。但我們不應簡單地把這些視作豐富多彩的革命裝飾品（adornments）。它們是重要的政治符號並在戰鬥和鬥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實際上，這是一系列有助於理解革命究竟是什麼的文化象徵、儀式和狂歡。與對它們的積極反應相比，我們更應該研究這些革命政治的手段或工具」¹⁰。很可惜現代中國沒有人嚴肅認真分析十月革命的旗幟、口號和主張等究竟與馬克思主義構成何種關係；陳獨秀在《馬克思的兩大精神》（1922）中倡言學習馬克思用歸納法研究社會問題的精神，呼籲「不要單單研究馬克思的學理」、「寧可以少研究點馬克思的學說，不可不多幹馬克思革命的運動」¹¹，以圖快捷運用馬克思主義；胡風在《最近的世界文壇》第八則〈馬雅可夫斯基死了以後〉中說，「自殺的原因是失戀」以掩蓋詩人之死的社會原因，甚至說詩人諷刺官僚主義的名作《澡堂》「銳利地諷刺蘇俄的現狀，但這也許是帝國主義新

⁸ 參見《少年中國》第1卷第8期（1920年2月）。應該說，這種陳述表明田漢先生對蘇俄問題是比較謹慎的。

⁹ 《瞿秋白文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第108頁。

¹⁰ Orlando Figes & Boris Kolonitskii, *Interpret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 Language and Symbols of 1917* (解說俄國革命：1917年的語言與符號).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1

¹¹ 參見《廣東群報》1922年5月23日。

聞記者的謠言」¹²；茅盾在《紀念高爾基》（1941）開篇就稱「高爾基是被托洛斯基派害死的。爲什麼托洛斯基派要害死這位暮年多病的老頭子？因爲高爾基是被蘇聯人民所愛戴的，是全世界勞苦人民所擁護的，他宣揚讚美者，正直、博愛、勇敢、公正、爲高尚理想而鬥爭的精神」；對法捷耶夫死於健康的原因，中國甚至有人解釋說，1955年6月在赫爾辛基舉行的世界和平保衛大會上見到他時「就有這樣的直覺：他的實際健康比表面上所能看到的，要壞得多。支持他出席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大會的，恐怕是他的堅決保衛和平的意志，而不是他長期爲病魔所折磨的肉體」¹³；30年代魯迅就在《譯文》雜誌上引進左琴科的幽默諷刺作品，1946年8月嚴厲批判左琴科與阿赫瑪托娃的聯共中央決議和日丹諾夫的報告在中國卻作爲政策性文件廣爲傳播，傑出作家的左琴科形象也就由此消失了，對事情何以如此和其他許多老作家的命運變化問題卻沒人去關注，以爲事情理當如此。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而事實上當時國際社會就已經發現，二戰前「蘇俄佔統治地位的文學流派，是一種文學上的官派，它組織得極可讚美，報酬也頗爲豐富」，同時伴隨有，很多著名老作家、傑出學者（包括《資本論》的名譯者巴黎羅夫）、基層領導者等，或者坐牢、流放、失蹤，或隨時被員警監控，「勞動立法糟糕得很，官僚們可以胡亂執行！那種國內身份證制度，剝奪了人民遷居權利；爲反對工人甚至小孩的法律，簡直痛苦得要人的命；還有連坐的法律也是很殘酷的……」，國際社會「正在建造一條反法西斯的陣線，但在我們的後方有這許多集中營，這是多麼妨礙了我們前進的道路」¹⁴。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對現代性的深刻批判，成爲20世紀國際社會審思現代化問題的重要思想資源，而蘇俄馬列主義雜有俄國農民共產主義和激進主義傳統，簡單化理解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經濟理念、經濟運作模式等思想，推出計劃經濟＝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等極端「理論」，在經歷軍事共產主義教訓後，列寧意識到了此舉的危險，便以新經濟政策替代之。而中國經由蘇俄接

¹² 《現代文學》第一卷第4期(署名“穀非”)，轉引自《胡風全集》第5卷第50頁，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¹³ 《文藝報》1956年5月30日。

¹⁴ 轉引自安德列·紀德著、鄭超麟譯：《從蘇聯歸來。附·答客難》，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1-12頁。

受馬克思主義，並不在意馬克思主義在俄國本土化過程的是是非非。

可見，中國經由蘇俄而來的是列寧主義革命理論和史達林經濟學，而不是經典的馬克思主義！

民族認同增加了新障礙

成就中華民族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是相當艱巨的任務：不僅僅有法權意義上的要求，更有能召喚民族認同的要求。

在飽經內憂外患大個世紀之久的中國，在 20 世紀初出現能動員全體國民的共和民主思想，孫中山先生在繼「三民主義」之後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這已經包含著通過蘇俄共產主義途徑實現民生主義的目標。也正因為如此，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社會形成了超出知識界的社會各階層廣泛參與的愛國運動。由是，蘇俄如何發展經濟問題客觀上會被關心。在美勤工儉學的張聞天，1922 年 8 月翻譯了英國曼賈斯特《經濟衛報》所刊載的蘇維埃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政府報告：全面論述了蘇俄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必要性、根據、基本原則、意義，提出「蘇俄要做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變遷中的一種經濟組織，它不會做純粹的社會主義，因為這種日子尚未到來；也不會做純粹的資本主義，因為這種日子已經衰敗。他是過去與未來的唯一結合—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元素混合的同時存在」，「指導蘇維埃俄羅斯事業的不是夢想者」，「而是共產主義的實際者」。這一重要翻譯，刊於《民國日報·覺悟》1923 年 1 月 18、19、21 日。稍後，胡愈之在〈俄國的農業復興〉（《東方雜誌》1923 年 11 月號）中介紹了莫斯科 1923 年全俄農業博覽會（設有外國參展部）盛況，並補充說蘇俄領導人在開幕式上演講強調俄國需要與西歐合作，俄國需要歐洲的資本、俄國預備犧牲極大的利益吸引外資，「當時在座的歐洲商人頗為動容。我們從這裏也可以看出蘇俄政府現在的經濟政策了」¹⁵。瞿秋白在《赤都心史》（1924）第 15 節〈貴族之巢〉中直接敘述了親眼目睹的新經濟政策時期的生動景象及自己對此的矛盾心情，「軍事共產主義之

¹⁵ 參見《胡愈之全集》第 1 卷，三聯書店，1996 年，第 175-179、198-202、431-432 頁。

下，滿街只有茫茫的雪色、來往步行的『職員』夾著公事皮包的人影了」，而實行新經濟政策很快就改變了此景，「十字街頭，廣場兩面，一排排小攤子，人山人海」，貴族階級利用新經濟政策開鋪子，猶太人更具有資本主義經濟活力，儘管他把打扮時髦的女子稱為「新妓女」、把咖啡廳一類俄國傳統消費視為屠格涅夫時代「貴族之家」在新時代的再現，又替貴族階級辯護說，俄國貴族向來痛恨資產階級，俄國文學沒有一點資產階級的貢獻，基本上是貴族創造的，有些共產黨人甚至也是貴族¹⁶。更為重要的是，惲代英在列寧去世之際寫下的《列寧與新經濟政策》（1924年），極力肯定列寧的偉大與新經濟政策的意義是聯繫在一起的，並深刻指出新經濟政策「暗示產業後進國實現共產主義的方法」、「暗示凡一種革命不是軍事上得著勝利，便可以稱為完全成功的。要改變社會的經濟狀況，軍事勝利以後，革命的黨還需依靠和黨的經濟政策」¹⁷。與此同時，中國反對新經濟政策的聲音更為強大，陳獨秀在《蘇俄六周（年）》（1923）中提及「更有人妄想俄國一經革命，共產自由的天國便當湧出，現在還鬧什麼新經濟政策，未免是變節欺人」。胡愈之在《莫斯科印象記》（1931）中對俄國新經濟政策做了另一種敘述：這到底不是根本解決的辦法，因為新經濟政策導致政府對農民加以放任、在農村富農階級如春草努長，極力推崇蘇俄所推行的農業集體化運動，稱「目前世界無論如何，農村衰落，農民經濟困難，農村與都市失調，成為不可挽回的危局，唯有蘇聯的農業社會主義話，為全世界農民開闢一條新路，為農民經濟的唯一轉化」¹⁸。

進而，對新經濟之後蘇俄社會經濟發展問題的繼續關心，在中國也就自然而然了。1933年丁文江利用去華盛頓參加國際地質學會第16次大會的機會，去了歐洲並順道在蘇聯停留了40天（從8月下旬到9月底），看看革命後15年如何利用既有的物質條件，在統一的國家、獨裁政治和計劃經濟裏造出什麼成績，作者因蘇俄已付出了巨大代價而希望它能成功，「如果用蘇俄的方法能使國民生活程度的逐漸提高、生產和消費相均衡，我很相信，用不著劇烈的階級鬥爭，西歐北美都要共產，至少現行的資本制度要徹底改變」，但刊於《獨立

¹⁶ 《瞿秋白文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第123-126頁。

¹⁷ 《惲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7-481頁。

¹⁸ 參見胡愈之：《莫斯科印象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3-86頁。

評論》上的《蘇俄旅行記》卻一方面正面敘述蘇聯重視科學（以地質研究的隊伍和科研經費為例）、革命群眾信念蘇聯（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工程師向他宣傳革命後的成績「富農已經消滅將盡，農業大部分集團化工業化，糧食問題不久可以完全解決了」）等情景，另一方面則傳達相反的資訊：一個人悄悄地用德文告訴他，「烏克蘭是我們最富的地方，那裏許多麥子放在地裏爛著，沒有人去收，去冬今春這一帶是荒年，許多農民餓死了」，在《再論民主與獨裁》（1933）中告訴了這部未完的《旅行記》所沒有來得及說的蘇俄遊結論，「我少年時曾在民主政治最發達的國家讀過書，一年前，我曾跑到德意志蘇俄參觀過。我離開蘇俄的時候，在火車裏，我曾問自己：『假如我能夠自由選擇，我是願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蘇俄的知識階級？』我毫不遲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問道，『我是願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時蘇俄的地質技師？』我也毫不遲疑的答道，『蘇俄的地質技師』」¹⁹。

對蘇俄問題如此矛盾敘述，在一定程度上是吻合當時蘇俄實際的：紀德的《從蘇聯歸來》（1937）證實了丁文江的敘述。在紀德看來，「來到蘇聯，為得是欣賞一個新世界，而人們卻拿舊世界中我所厭惡的一切特權獻給我，藉以誘惑我」，因而要透過「社會欣欣向榮」表層發現具體蘇俄問題，諸如物資嚴重匱乏、城鎮建築和每戶家庭甚至每個人一樣毫無個性（「全體幸福只有消解個人個性才能得到。全體幸福只有犧牲個人才能得到」）、閉關鎖國的狀況（在蘇聯常聽到這樣的聲音，「幾年前德國和美國幾點可以給我們學習，但現在我們無需向外國人學習什麼了。那麼講外語有什麼好處呢？」，「外國文學經典和我們有何相干呢」，以至於紀德準備好的關於蘇聯文學與世界文學關係之演講也被取消）、嚴厲打擊不同的聲音等。後來為該書所遭責難，紀德作答辯文 *Retouches a mon Retour de L'URSS* (1938)，其中大量引用了當時《真理報》和《消息報》上所提供的官方資料，嚴謹地呈現出蘇聯工業生產品質問題嚴重且勞動效率低下的情況（包括學生練習本和教科書、傢俱、醫療器械等各種產品）、拖欠教師工資和侵吞教育投資、交通混亂、工人住宅狀況遠比革命前還差，愛森斯坦之類著名藝術家遭政治審查而藝術生產量低。此前德國左翼作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的《莫斯科日記》（1926年12月6日至第二年1月底在莫斯科）也

¹⁹ 《獨立評論》第 152、137、100、50 號。

有類似敘述，如「俄國對世界的瞭解要比世界對俄國所知要少……可以說，俄羅斯對世界其他地區的無知，很像十盧布的票子：在俄羅斯很值錢，但在國外不被承認為硬通貨」，「蘇俄國內事務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新經濟政策事在國家利益的名義下得到人們寬容的。任何主張新經濟政策的人一夜之間可能因經濟政策的轉變或宣傳調子的過時，成為犧牲品」²⁰。諸如此類現象，恰如鄧小平後來所說，「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鄧小平文選》第 3 卷第 139 頁），可惜中國在很長時間接受的是革命的而非建設的列寧主義，外加期間中國發生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爭中否定後者的呼聲漸長，國際社會對蘇俄的敘述沒在中國引起廣泛關注，當然也就不會產生效果，如田漢在《詩人與勞動問題》（1920）中稱，「自近世產業發達以來，資本主義與個人主義流為一氣，資本階級對於勞動階級類取 more work less money（多做工少給錢）的方針，以勞動者的血汗肥其私囊，奢侈淫樂無所底止，釀成物價騰貴，使勞動者益不能自隨其生，勞動者『加錢問題』、『同盟罷工問題』都由此而起」，立足於此論梳理古典主義與資本主義、浪漫主義與民主主義、自然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關係，並把文學發展動力和過程建立在這類關係上²¹；1920 年 9 月羅素在《時事新報》發表《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稱，救中國只有開發實業和發展資本主義這一條路，陳望道、李達、邵力子和陳獨秀等人立即反駁，出現著名的《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共 13 篇，載《新青年》第 8 卷 4 號）。「反資崇社」、「反西崇蘇」在後來更為興盛，被監禁在國民黨中央軍人監獄中的獄友們得知鄭超麟要翻譯紀德的《從蘇聯歸來》時，就勸說別看，因為是「反蘇的」，樓適夷則不聽，「爲此事還挨了難友們的批評」，譯本果然引起很大的爭論，抗戰到來才中止了這一爭論。

諸如此類意味著，中國接受進步蘇俄的同時，忘了接受目的是要建構獨立而能發展民生的民族國家，或者說，重建中華民族是要讓全體國民在受益中自覺認同。

²⁰ 本雅明著、潘小松譯：《莫斯科日記·柏林紀事》，東方出版社，2001 年，第 70、92 頁。

²¹ 參見《少年中國》第 1 卷第 8、9 期（1920 年 2、3 月）。

「民主」外延日趨縮小

同樣嚴重的是，中國對俄羅斯的熱情想像，卻沒有認真辨析蘇俄「民主」是否中斷了俄國一直存在的個人崇拜傳統，從而影響了自辛亥革命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降已經深入人心的「共和」與「民主」理念。

在帝俄時代，一代代沙皇及其無限權威被民間視為上帝在人間的代表形式，而二月革命後建立了民主共和的臨時政府，卻沒改變這種傳統！後來被蘇俄政府打倒的克倫斯基在臨時政府建立時就被民眾崇拜了：詩人瑪麗婭·茨維塔耶娃曾有詩稱他為俄國的拿破崙（「一個波拿巴來到了／我們的國家」²²），著名小說家庫普林稱他為「人民的良心」²³，傑出畫家列賓給他畫了肖像畫，不少著名藝術家曾給他譜過曲，科學院院士和著名文學史家 C·溫格羅夫聲言「有人稱克倫斯基是俄國的丹東時，我通常是很生氣的。他就是克倫斯基，僅此他就足以不朽了」。著名詩人吉皮烏斯認為，1917 年秋天彼得格勒知識界還認為克倫斯基是神聖的、不能容忍有人對他進行任何批評，即便是不少人對他有看法，但他依舊是最受歡迎的，在他任職的「四個月間是被當作神來崇拜的」²⁴。1917 年 6 月一個新聞記者寫道，「克倫斯基是軍隊的偶像，他的名字到處被傳頌。士兵們的決議、訴求、演講常常透出他的權威，如『克倫斯基同志是這樣說的……』，『克倫斯基同志是那樣說的……』，『我們親愛的克倫斯基命令……』」，有一位英國護理驚愕地觀察到俄國人熱烈「親吻他，吻他的制服、車、他走過的地方。有些人對他頂禮膜拜，另一些人對他熱淚眼眶。這種宗教式崇拜只有俄國農民崇信沙皇之父才有的」；臨時政府軍事委員會認為克倫斯基是「人民的部長」、「是不可替代的革命軍事領導人」、「俄羅斯民主的真正領導者」、「為一種理想鞠躬盡瘁的戰士」、「心愛的領袖」、「民主的象徵」、「我們最好的領袖」，這些是人所皆知的歷史。局勢大變後，對列寧的崇拜逐漸替代克倫斯基，很快出現「列寧同志萬歲」的口號，1918

²² M. Tsvetaeva,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и поэмы, New York, 1982, Vol.2, p.63.

²³ 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 30 5 1917 // Свободная Россия 12 Июне 1917.

²⁴ А. Г. Голиков, Феномен Керенского(克倫斯基現象)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5, 1992, С.68

年列寧被暗殺而死裏逃生，在民眾看來這正意味著列寧是真正的基督、具有神奇的力量²⁵，國內戰爭快結束和蘇聯建立之後，對列寧的崇拜逐漸規模化、制度化，儘管列寧本人對這種個人崇拜現象是深惡痛絕的（關於這方面和批判官僚主義的文獻很多，在此不再贅述）。在激進的反君主專制政體革命不久，很快就出現類似崇拜沙皇那樣崇拜革命領導人現的現象，這與二月革命以來沒有徹底改造俄國傳統的政治理念不無關係：政治文化依舊牢牢植根於專制政體傳統，民主繼續讓位於武力和權威，在俄國新的政治處女地上新的民主制度要求相應的心理、甚至政治民主的語言都沒有培養出來，大部分民眾還是信仰君主專制時代的政治，在「仁慈的沙皇」神話中包含有類似宗教式的信仰，即國家所有問題要靠賦予領袖更大神聖權力來解決、把君主制下的臣民管理和民主國家的制度化管理混為一談、在民眾心目中「真實（истина / truth）」和「真理（правда / justice）」及「政府（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 government）」是合體的（在俄語中，「真理／правда」與「政府／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詞根相同）、權力被神化等，而這也正是大眾關於革命及其領袖的理念，因而農民把克倫斯基當作「新沙皇」、把列寧和史達林當作至高無上的領袖崇拜。以公平和民主為核心的法律體系在俄國遲遲建立不起來，這個問題在 20 世紀初已經被俄國知識界所關注²⁶。由此，蘇俄新政權不僅自然延續了這種與「民主」對抗的俄國個人崇拜傳統，而且改造了「民主」所指：「民主」從法國進入蘇俄之後，就變成了階級語言而背離了原本面向全體國民的所指、被賦予了階級限制，即只有「勞動階級」才有權享受「民主」，而受到最好教育並且也是一代代帝國政府科技和教育等生產力發展主體的「資產階級」被排除在外，儘管這種只有窮人、工人和農民才權享有「民主」的做法當時就有人強烈反對²⁷，但作為制度一直延續到蘇聯末期，「資產階級越少，民主越多」口號幾十年來不絕於耳；即使是在城市裏，工人階級所理解的「民主」，也沒有涉及「制度」和「議會」、「公民權」和「法律」之類關鍵性內涵，而

²⁵ See Nina Tumarkin, *Lenin Lives! The Lenin Cult in Soviet Russia* (列寧萬歲！蘇聯對列寧的崇拜). Mass.: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²⁶ Б. А. Кистяковский, В защиту права(保衛法律)// В кн.: Вехи. М.: Тип. М.Саблина, 1909. С.125-140.

²⁷ Н. А. Арсеньев, Кратк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для всех. Москва, 1917, С.9.

是變成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口號（諸如「我們的革命」、「我們的勝利」、「我們的解放」等），具體主要指「蘇維埃」和「工廠委員會」這些細枝末節方面；至於在鄉村一村社，「民主」和「共和」概念同樣不是指向全體村民，因為「公民」並不包括鄉村的士紳、地主、商人等「非勞動階級」，而且農民未受現代公民教育，對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使用的概念，諸如「共和國」、「憲法」、「聯邦」、「民主」、「政體制度」、「革命」和「社會主義」等，在他們看來全部是輸入的外來詞，基本上是聽不懂或誤讀和誤解的，他們以疑惑的眼光對待城裏發生的一切和從城裏來到鄉下的宣傳員，要求他們「必須講俄語」²⁸。也就是說，「民主」和「公民」概念，在俄國被賦予了更多的「階級鬥爭」內涵、被重新解釋成適合沒有文化知識的「勞動階級」所能理解和需要的形式，排除了個體公民自我認同的人權和全體國民認同的民族國家的基本所指。

蘇俄「民主」理念顯然不吻合辛亥革命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共和」與「民主」潮流：梁啟超的《新民說》極力倡言全民自由和民主；陳獨秀的《敬告青年》（1915）依據歐洲現代「人權」概念呼籲「破壞君權，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認教權，求宗教之解放也；均產說興，求經濟之解放也；女子參政運動，求男權之解放也」，而其《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1915）直接提及「人權宣言」、「民主的社會」、「人人於法律之前，一切平等」等；張東蓀在〈行動與政治〉（《甲寅》第1卷第6號，1915年6月）中把 democracy 或 popular government 譯成「惟民主義」並解釋道，「所謂惟民主義乃謂之人民以自身之能力，運用政治耳」；1919年初陳啟修在《北京大學月刊》1卷1號著文〈庶民主義之研究〉明確提出「庶民」是指 all people；宋介的〈社會自由〉（《曙光》1卷2號，1917年12月）、詹夫的〈何謂新思想〉（《東方雜誌》16卷11號，1917年11月）等重要文獻，也普遍強調全體國民共用的民主。十月革命後，蘇俄的「民主」觀念很快傳入中國並逐漸改變了現代中國正在成形的「民主」或「共和」理念，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 的勝利》把「民主」變成了對下層階級的解放、毛澤東等人創辦湖南自修大學時宣導平民主義式民主，甚

²⁸ Orlando Figes & Boris Kolonitskii, *Interpret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 Language and Symbols of 1917*(解說俄國革命：1917年的語言與符號).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至當時梁啟超和張東蓀這派的重要人物彭一湖也重新解釋自亞里斯多德以來的西方「民主」內涵，並得出結論說「『德謨克拉西』是以貧者為政的政治」²⁹。後來，陳獨秀也逐漸改變了對「民主」看法，〈俄羅斯十月革命與中國最大多數人民〉（《嚮導》週報第 90 期，1924 年 11 月 7 日）聲言，「十月革命是真有利於最大多數人民—農民、工人、小工商業家—的革命」，告誡中國人民，「應該接受俄羅斯十月革命的精神」。其實，對「民主」要演變為「平民主義」、下層貧民權力的現象，1920 年 11 月 9 日《民國日報》發文〈布爾什維克與世界政治—羅素在湖南演講〉已有警示：「布爾什維克主義極不贊成民主（此乃蘇俄與西方不融合的一大原因），他剷除人民言論自由出版，我極不贊成。我以為布爾什維克可用別的辦法使人民知道真理，不必用強迫手段。這種辦法最不好的結果是平民專制—人民受壓制難復自由、手段太激烈會發生戰爭」。很遺憾，這種「民主」後來成為中國的國策，給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和社會管理帶來重重困難（如文革中「革命群眾」享有「大鳴大放」的民主），直到這個世紀之交此等「民主」才被改革，「民主」在所指上逐漸包含「人權」、「公民權」、「國民待遇」等內涵，不再有階層限制而面向全體國民。

由此引發更嚴重的問題：簡化了對蘇俄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的理解，看到的是其階級性意義而非民族性問題和民族主義訴求，繼而促使現代中國突現社會各階層的矛盾而弱化各族群的相互認同。著名的民族主義問題學者華生（Hugh Seton-Watson）研究證實，1905 年事件「既是工人、農民和激進知識份子反抗專制的革命，也是非俄羅斯人反抗俄羅斯化的革命。當然，這兩個反叛是相互關聯的：事實上，這次社會革命在以波蘭工人、拉脫維亞和格魯吉亞的農民為主體的非俄羅斯地區表現得最為激烈」³⁰。打破二月革命的理想所發生的蘇俄十月革命和蘇維埃制度建立過程更是如此，除了共產主義傳統和國際反資本主義潮流影響之外，民族主義訴求在其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不僅沒有解決帝國一直存在的各族群間矛盾，而且使得由來已久的俄羅斯認同之分裂進一步危及到俄羅斯認同本身

²⁹ 參見《每週評論》第 8 號(1919 年 2 月)。

³⁰ Hugh Seton-Watson: *Nations and States: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N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民族與國家：對民族起源與民族主義政治學之探尋). London: Methuen, 1977 p.87.

³¹，「紅旗」、「紅星」、「紅軍」、「打倒一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等口號，掩蓋、壓制了民族性訴求，卻不能消除「共產主義」敘事下所掩藏的民族主義問題，如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中亞穆斯林、高加索等地區建立蘇維埃制度的過程，一直伴隨著這些地區民族文化價值的獨立性被消解、族群意識被弱化、民族性被本土化的過程，以及俄羅斯帝國意識形態在共產主義名義下以制度性力量得以順利擴展³²，並導致蘇俄的非歐洲部分基本上是以「殖民地」身份參與蘇聯建設（「輸出原料基地」、「專業生產區」、被強制性推行俄語的附屬區等）。1830 年代帝俄政府提出官方民族性理論沒有解決俄國民族認同問題，史達林提出的設想「蘇聯最終解決了由十月革命前遺留下來的民族性問題」（如合作完成著名小說《十二把椅子》的作家伊裏夫和彼得洛夫 1930 年代在美國訪問期間被人問及「蘇聯如何解決猶太人問題」，他們答曰：「這是不必要解決的。我們是有猶太人，但我們沒有猶太人問題」），被蘇聯歷史和當代俄聯邦社會變革所遭遇的諸多問題證明，同樣也是一廂情願的幻想³³。進而，蘇聯制度確立後，在馬列主義的名義下，能在境內合法推行斯拉夫—俄羅斯族裔中心主義、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理直氣壯地推行蘇聯國家中心主義，並把「蘇聯」的地方性意義自然而然地提升為全球性的價值標準。令人深思的是，法國政治學家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中已指出深刻指出：征服世界，美國用的是勞動者的犁、俄國則靠的是劍³⁴。可以說，蘇俄後來並沒有改變這種傳統。

³¹ Quoted *Social Identities in Revolutionary Russia*(革命中的俄國社會認同). Ed. by Madhavan K. Palat, New York: Palgrave Publishers Ltd, 2001, pp.134-155.

³² See Richard Pipes,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1917-1923*（蘇聯之形成：1917-1923 年間的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Revised Edition)

³³ See Alter L. Litvin, *Writing History in Twentieth-Century Russia: A View from Within*（書寫 20 世紀俄國史：一種來自內部的觀點）(trans. by John L. Keep),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p.117-127.

³⁴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商務印書館，1988 年，第 480-481 頁。

作為民族國家的蘇俄被「真理化」

對在俄式馬克思主義名義下重建俄國的複雜性及其意義問題，中國應該是有人能關注到的：一方面 1921 年 3 月號《東方雜誌》上有文〈馬克思的最近辯論〉，及時介紹了當時歐洲馬克思主義研究新進展，並特別引述羅素遊俄歸來後之作《布林什維主義的理論與實踐》重要思想，即「決定一時代或一民族的政治與信仰，經濟的原因自然是很關重要的，但是把一切非經濟的原因一概不顧，只以經濟的原因斷定一切的運命，而以為一無錯誤，這個我卻有些不信。有一種最顯著的非經濟的原因，而亦是社會主義者所最忽視的，那便是民族主義了……單看大戰中，全世界的傭雇工人—除極少數的例外—都被民族主義的感情所支配著，把共產黨的寶貴格言『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已完全置諸腦後了。馬克思派斷定所謂人群只是階級而已，人總是和階級利益相同的人互相聯合起來的。這句話只含一部分的真理。因為從人類長期的歷史看來，宗教乃是斷定人類命運的最主要的原因……人的欲望在於經濟的向上，這話不過比較的合理罷了。馬克思的學說淵源於 18 世紀唯理的心理學派，和英國正統派經濟學者同出一源，所以他以為『自私』(self-enrichment) 是人類政治行動的自然要求。但是近代心理學已經從病的心理的浮面上談下去，為更進一層的證明。過去時代的文化樂觀主義，已給近代心理學者根本推翻了。但是馬克思主義卻還是以這種思想為根據，所以馬克思派的本能生活觀，不免有殘刻呆板之肖了」，還提及了考茨基有關文章辨明俄國布爾什維克的行動「和馬克思主義不合」，又另外論及英國司各特博士 (Dr. J. W. Scott) 新作《馬克思的價值論》和《現代評論》上討論俄國實踐馬克思關於工業國有化理論但效果欠佳之文，最後總結說「馬克思的社會進化理論、勞動階級勃興論、貧乏廢滅論，現代學者大概都加以承認，只是他的價值法則、唯物的歷史觀、武力的革命理論、階級鬥爭說、無產階級專政的計畫，卻還沒有成為一定不易的理論呢」。

另一方面發生的諸多事實也迫使中國知識界和政界注意蘇俄，因為這種俄羅斯帝國中心論不僅主導著蘇俄建構過程，而且推延及世界，尤其是成為處理與中國關係問題的原則：1919 和 1920 年蘇俄政府兩次對華宣言發佈之間，蘇俄獨自派紅軍進入屬於中國版圖的蒙古並在中東鐵路問題上繼續帝俄政府政策；1923 年蘇俄政府任命越飛為駐華特命全權大使

與孫中山和吳佩孚談判，很大程度上是看重他們乃中國實力派人物；1924年蘇聯政府名義上廢除帝俄政府外交政策，但與國民政府繼續簽訂共管中東鐵路協約，引起中國民眾的憤怒，1929年國民政府迫於民眾壓力而解除這一不平等協約，差一點引發戰爭並使得國民群情激奮³⁵；至於蘇聯利用共產國際的話語霸權對中國革命進程進行干預，使中國形勢變化服從于蘇俄國家安全和民族利益，那已經是人所皆知的事實。後來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陣營中推行蘇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擴張蘇俄國家利益那就更如此了，如史達林曾聲言，「誰決心絕對地、毫不動搖地、無條件地、公開地和忠實地捍衛蘇聯、保衛蘇聯，誰就是革命者，因為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國家。誰決心絕對地、毫不動搖地、無條件地、公開地和忠實地捍衛蘇聯，誰就是國際主義者，因為蘇聯是世界革命運動的基地，不捍衛蘇聯，就不能捍衛並推進世界革命運動」³⁶，他還譏諷恩格斯批評帝俄之作《沙皇俄國的對外政策》（1889）「寫得有點興奮，所以一時忘記了一些最基本的、他非常清楚的事情」，反對把他譯成俄文發表。至於在維護國際共運的名義下，1938年強行解散波蘭共產黨、1943年爲了和西方國家合作解散了共產國際、戰後爲了同西方陣營對抗又在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名義下恢復共產國際（實際上成爲蘇聯指揮和控制各國共產黨的中心）、東歐大批知識份子和黨的中高級幹部被清洗或監控等，勿需贅言³⁷。

可是，現代中國進步知識界因強烈認同十月革命，真以爲蘇俄革命的確解決了俄國弱小民族受大俄羅斯壓迫的問題，還開創了東方民族獲得獨立的新局面，基本上沒有注意到蘇俄革命和蘇俄馬列主義的民族主義訴求問題。一方面在理論上充分肯定蘇俄革命的普遍意義，從陳獨秀的《十月革命與東方》（1926）熱誠表述中能顯出來：他盛讚十月革命對東方尤其是中國的偉大作用，主要是針對當時蘇俄一部分認爲援助中國革命是多事、另一部分人以爲蘇俄以援助東方民族革命運動結怨於列強不合算、國內反對接受蘇俄援助等輿

³⁵ 參見魯迅：《吾國征俄戰史之一頁》（1929），《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143-144頁。

³⁶ 《史達林全集》第10卷，第47頁。

³⁷ 關於蘇聯與中國談判東北-滿洲和新疆等具體問題時，以及《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過程中所顯露出來的蘇俄利益中心論立場，請參見李丹慧編：《北京與莫斯科：從聯盟走向對抗》，廣西師大出版社，2002年。

論，進而提出反駁意見說，只有軍閥和帝國主義走狗「大叫蘇俄援助中國民族革命有野心……他們以為帝國主義與軍閥非中國之患，中國大患只是蘇俄所援助的國民革命」，即便是主張獨立革命者也沒看到，「若因有蘇俄援助可以增加我們革命發展之速度，似乎也沒有理由應該拒絕，更無能由此反對蘇俄」，認為蘇俄援助中國革命自有野心而非善意援助之論是完全不懂蘇俄十月革命之世界意義，「試問蘇俄因援助中國國民革命軍曾經得到些什麼？」，斷言「蘇俄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義，關係東方被壓迫的民族革命運動，非常重大」³⁸。另一方面在感性經驗上排斥中國自身的民族性訴求合法性，這從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記》（1931）中能看出來，他說「知道蘇俄的將來，便知道了全人類的將來」，驚奇於「所遇到的許多成人都市大孩子的天真、友愛、活潑、勇敢。有些人曲解唯物主義，以為蘇聯的生活殘酷的、機械的、反人性的，我所見的恰好正相反」，針對蘇聯的一些宏大主張而感慨道，「試想國家、種族、階級、身份成見除去之後，再有什麼能阻礙人與人的相愛呢？」，從所遇到兩位老華僑對蘇俄政府禁止把盧布匯出境外的抱怨中，他卻感慨「中國人到處被人憎惡，也正因為拘守著農業社會所遺留下來的鄉土觀念、家庭觀念牢不可破的緣故（即無論在哪兒總要想著老家一攢錢寄回國）。甚至在無產者的國家裏，種族與國別的歧視已經完全消失了。這點在俄國可以完全相信。俄國人不但不歧視有色人種，而且看得比自國人更親切，因為他們是同情與弱小民族的。中國工人卻依舊頑固地保守著他們的觀念形態，他們雖已經成了解放了無產階級中的一員，卻仍然保持著數千餘年來農業社會的原始頭腦，革命與階級鬥爭他們全然不瞭解」，儘管發現布爾什維克在政治上主張國際主義、在文化上主張民族主義，卻盛讚世界上沒有哪個政府對民族文化、民族語文、民族文藝能像蘇維埃那樣的積極提倡和保護，革命前俄國文學受西方影響很大，因而是世界性的，新興的普羅文學是地方性的，鄉土的民族的色彩非常濃厚，普羅文藝的最大源泉是民間文藝，所以不能不是民族性的，對此矛盾他以史達林言論「社會主義內容、民族的形式」而迴避之³⁹。

由此，列寧的《論民族自決》（1914）、《論大俄羅斯人的民族自豪感》（1914）和史達林的諸多強調民族主義的階級鬥爭性之說，成為現代中國理解俄國問題的指南性文獻，「人

³⁸ 參見《嚮導》週報第 178 期（1926 年 11 月 15 日）。

³⁹ 參見胡愈之：《莫斯科印象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6-17、63-66 頁。

民／народ」和「人民性／народность」概念的重要性也日漸突出。中國在巴枯甯和克魯泡特金等人文本中已發現這對原本是用來對俄國居民進行階級身份限定的概念，所有論及克魯泡特金的《俄國文學的理想與現實》中這對概念時，都翻譯成「人民」和「人民性」。其實，在俄國文化結構中，政治意識形態性的語義僅僅是對這對概念的一種義項，它還有族群義項、文化概念（如拉吉舍夫在《從聖彼德堡到從莫斯科旅行記》中就有言「任何感受到俄羅斯民歌悅耳音調的人，都會領略到其中沉重悲傷的表達……會從中發現我們俄羅斯人的靈魂形式」⁴⁰）、哲學韻味（維亞澤姆斯基公爵翻譯謝林的《自然哲學》涉及這個概念時，賦予其「人性」／humanity 語義）⁴¹。本來，這對概念在俄國生成過程中是深受德國浪漫派的民俗學影響的，斯拉夫派試圖通過這對概念更切近土地和本土文化傳統，但比德國人走得更遠，即把俄國農民視為俄羅斯「民族精神」的保護者，把農民想像成唯一有資格代表「人民」的社會集團，認為只有他們才沒有被西化所腐化，受過西方化薰陶的知識界和政界被排除在「人民」之外，與德國的「公眾」和「人民」概念相比少有共同點（德國並不把知識份子從民族傳統中排除出去），斯拉夫派認為「public 純粹是西方現象」，在列斯科夫的《左撇子》中俄國民族性的最簡潔意象就是中下層社會，這些人有別於西歐享有民主權的「公民」，即便是在後來中國日益走紅的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這類批評家的文本中，他們使用這對概念也不完全局限於意識形態範疇，而是有著民族性考量的，民粹派運動把「人民」理想化推向了頂峰，蘇俄延續了這些敘述卻剔除了其中的民族性，由此簡化了俄國文化的複雜結構：18世紀彼得大帝改革伊始，俄國文化就出現了上下層分化、知識界和民間的分裂，但是知識界積極關注俄國民眾社會問題並身體力行（如民粹主義運動）、隨現代化進程社會結構不斷調整並出現很多新階層，尤其是一直存有超越社會制度和結構的斯拉夫民族性和基督教信念；強烈的民族意識、普遍的民族性訴求貫穿於18世紀以來的文學發展過程，知識界在民族性訴求問題上與帝國意識形態相一致，1880年6月在普希金銅像揭幕典禮儀式上的諸多演講能體現出這種特點，因為連陀思妥耶夫斯

⁴⁰ А. Н. Радищев,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из Петербурга в Москву*. СПб.: Наука, 1992, С.8.

⁴¹ *Russian Modernity: politics, knowledge, practices* (俄羅斯現代性：政治、知識、實踐). Ed. by David L. Hoffmann & Yanni Kotsonis. Macmillan Pres Ltd., 2000, pp.41-62.

基這樣以世界性眼光考量民族性問題的人，在此也借助普希金話題把俄羅斯性擴張成歐洲性，即使是 19-20 世紀之交這個相當國際化的白銀時代，民族主義也是影響已經成熟的學術研究格局的主流思潮，諸如謝爾蓋·溫格諾夫所編輯的 6 卷本《俄國作家和史學家的評傳詞典》(1886-1904) 和《普希集全集》等經典文獻，基本上是在民族認同表述中表達帝國意識形態訴求的⁴²。由此，18 世紀以來的現代化遭到抵抗而被稱之為西化（更有人譏諷地把英文西化 westernization 音譯成俄文 Вестнернизация）。蘇俄革命和社會主義既延續了「人民」傳統，同時融合了強烈的民族認同，因而更強烈反對西化，導致因為情緒激烈而非理性的否定傳統、不合規範的批判歷史、情緒化的反現代文明等（儘管馬克思和列寧本人曾嚴厲批判過集中體現這種文化的民粹主義）。這些決定了判斷俄國社會問題的標準僅用「人民」和「人民性」概念是不夠的，甚至是很不恰當的。

對於俄國革命的民族性傳統和蘇俄社會主義融合民族性訴求問題，田漢在《俄羅斯文學思潮之一瞥》中已有所暗示，「俄人於教旨凌夷之西歐，負有救以正教之使命。其主張國民性是也。謂一般人類之要素，俄國民性實體現之，以此特性為基而築以俄民獨特適應之生活。所謂獨特適應之生活者，宗教傾向外即村團（土地共有制度）之理想是也。此制即現今社會主義者所理想之共產制。一村之農民以村中之土地為公有而分耕之，無所有權，以互助之精神謀全般之幸福雲。綜斯三者，其為希伯來主義之變相，深切著明。而言正教，舉獨立自由之精神，自謂遠紹希臘團村之制，亦非蕩平個性使從社會生活，而有各個性根於互助精神，謀全般幸福之意味，則又雜有希臘思想也。是知兩派之間雖各有其世界觀，至謀人類幸福則各不相讓。故希臘主義之西歐派欲達個性自由發展與個人之社會權利之目的，希伯來主義之斯拉夫派欲達其建立理想土地共有生活、國民特性之目的，皆趨於『農奴解放』之共同目的焉」⁴³。田漢有些表述雖不準確，但俄羅斯文明結構的確龐雜而矛盾，激進主義革命只是其中之一，儘管是在宏大話語下推進的，卻是促成俄羅斯文明不穩定的重要因素。對正日益影響中國的蘇俄革命，知識界和思想界有所警惕是應該的：在本質上

⁴² See Andy Byford, S. A. Vengerov: The Identity of Literary Scholarship in Later Imperial Russia.//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81(No.1,2003).pp.1-31.

⁴³ 參見《民鐸》雜誌第 6 期（1919 年 5 月）。

它與中國文化傳統並不對接。當時國際著名學人羅素就深感「俄國問題，確實與中國的問題有很大的相似之處，但它們之間也有重大差別，而且前者的問題毫無疑問要簡單一些」⁴⁴。按李澤厚的中國文化傳統之論，對中華民族長久發生巨大影響的孔子仁學強調把社會外在規範化為個體的內在自覺，並通過情感與理性的合理調節，在取得社會存在和個體身心的均衡中維持社會秩序、規範、禮儀及其有序變化⁴⁵。胡愈之在《莫斯科印象記》中呈現出中國人對蘇俄共產主義具體情景的矛盾：既很讚賞蘇俄改革「星期」制度打擊了由來已久的基督教傳統，又疑惑用五天輪流的工作制替代統一的七天工作制，推行個人生活的社會化和集團化制度，沒把家庭生活看作「良風美德」，並因婚姻改革、離婚便利、婦女經濟獨立、公共育兒室的出現和公共食堂的擴張，出現家庭崩潰的趨勢（目睹接待他的 U 同志和一女歌唱家組成所謂無產文藝者的家一同居的事實就意味著結婚，因而疑惑蘇維埃的婚姻制度—不需要婚姻註冊，即便是註冊也主要是爲了孩子的撫育、多一點福利，感慨男女關係是解放自由了，但所謂「家」卻因此而瓦解），最後一天參觀莫斯科汽車製造公司，對集體生活的規模、程度和方方面面深表讚賞，認爲這樣的集團化和社會化生活才真正解除了由以家庭爲中心而來的自私、貪鄙之習性⁴⁶。可是，因爲近代以來中華帝國屢遭危機而不能化解，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均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問題，由此孕育出激烈反對外來帝國主義和自身文化傳統的急躁心態，並不去辨識俄國激進主義民族性傳統，以至於早在 1896-1916 年翻譯 800 來種國外小說中「虛無黨小說」佔有絕對比重：「虛無黨小說產地是當時暗無天日的帝國俄羅斯。虛無黨人主張推翻帝制，實行暗殺，這些所在與中國革命黨行動有不少契合之點。因此，虛無黨小說的譯印，極得思想進步智識階級的用戶與歡迎」（阿英《翻譯史話》），周作人還譯了克魯泡特金的理論著作《論俄國革命與虛無主義運動》（1907）。更爲遺憾的是，中國因爲要尋求現代化的精神資源、抵禦來自西

⁴⁴ B. Russell, *The Problem of China*.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60, p.9.

⁴⁵ 參見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7-51 頁。

⁴⁶ 胡愈之：《莫斯科印象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43-44、61-63 頁。紀德卻發現，蘇俄取消墮胎法律給社會帶來的嚴重問題（「倘若那邊某位醫生的話可信，那麼蘇聯是手淫最普遍的國家」）（《從蘇聯歸來》第 134 頁）。

化的壓力，五四新青年也沒來得及辨析整體俄國文化情境就選擇俄式共產主義，並賦予它作為中國現代化精神資源的普遍性意義，還忘卻了其包含的民族性訴求，在中國培植俄國的民族特產，結果導致很多問題：雖然使蘇俄「進步文學」替代這種類虛無黨小說，但把豐富複雜的俄國文學史簡化為為數不多的文學家或批評家反農奴制和資本主義改革的歷史，並推演出蘇俄文學批評和理論就是中國進步文學的標準；不再去認真探尋「人民」和「人民性」概念的俄語文化學辭源，而是遵從蘇俄而閱讀之，進而把蘇俄社會視為成功實踐馬克思主義的範例，使這些概念成為中國認識蘇俄社會、分析中國社會、劃分世界等關鍵性術語，也就自然而然的了，儘管列寧在《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1912）中曾深刻指出，「中國愈落在歐洲和日本的後面，就愈有四分五裂和民族解體的危險」⁴⁷，即中國不僅要解決社會階級衝突問題，更要面對民族認同之建構問題，「民族」概念比「人民」概念更為重要。

由此，特別蘊含了「人民性」所指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一蘇俄理論，在中國得到了幾乎與蘇俄同等關注和運用：婉龍的《新現實主義文學概觀》（1934）聲稱，蘇聯經過勞動階級 16 年專政，從產業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份子中產生了不少新的作家，這就是新現實主義文學的先驅，而且蘇聯新現實主義文學對人生抱著非常的熱望、不斷關注人生，用藝術寫作幫助解決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是徹底的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在階級環境中表現英雄，斷言「新現實主義便正是一個不可阻擾的浩蕩洪流，它不惟衝破了俄羅斯文學的舊堡壘，而且已經氾濫在世界大部分。只要有勞動階級運動的地方，便有新現實主義浪潮」⁴⁸。更有甚者，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我們是主張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並喻之為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周揚解釋這種「理論移植」行為說，「從『五四』開始的新文藝運動就是朝著這個方向前進的，這個運動的光輝旗手魯迅就是偉大的革命的現實主義者，在他後來的創作活動中更成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偉大先驅者和代表者」⁴⁹。此後，無論中蘇關係發生怎樣的變化，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問題的

⁴⁷ 《列寧選集》，第 2 卷，第 28 頁。

⁴⁸ 《清華週刊》，第 42 卷，第 9-10 期合刊，1934 年 12 月 27 日。

⁴⁹ 《周揚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第 2 卷，1985 年，第 247 頁。

討論一直被我們關心，而且以積極姿態認同這個理論體系：幾乎沒有人去辨別其蘇俄國文化身份問題。隨著理論上強烈認同蘇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具體文學現象認識上同樣信奉蘇俄文學意識形態的普遍價值，也掩蓋蘇俄文學的民族身份：茅盾的《二十年來的蘇聯文學》（1939）按當時蘇聯標準看待新俄文學 20 年，認為新經濟政策之後文學復蘇起來了，謝拉皮翁兄弟及支持者瓦隆斯基雖犯有重大錯誤，「但在打擊形式主義及主張藝術是階級的實際行動的表現這二點上，總算是相當盡了清道夫的作用」，隨著社會主義勝利、社會主義建設開始、消滅富農階級的鬥爭的展開，「這一切都反映在文學上：一些把握不住當前現實的既成作家們彷徨而失措，甚至走到反動方向；大批經過鐵和火的磨練，對於『明日』有堅強的全新的青年大踏步跨進了文壇了」，這便宣告了蘇維埃文學的誕生，出現了一系列力作，「多種多樣的『以民族為形式、社會主義為內容』的民族文學燦然開花了—這一切便反映在文學，成為空前的莊嚴燦爛的奇觀。社會主義寫實主義不復是文藝批評上的一個術語，而是活生生的現實了」，「作為集體創作的豐碑的，是高爾基指導下的《工廠史》和《內戰史》，前者描寫帝俄世代工人階級所走的那段極長的道路……後者的主題則是沙皇時代的工人農民為爭取政權、建設社會主義國家而武裝鬥爭的經過。在這作品內，將反映出列寧與史達林的天才的領導」⁵⁰；西蒙諾夫的第 5 個劇本《俄羅斯問題》（1946）構造美國「正義青年」和「反動政府」對立看待蘇俄的意識形態劇，上海時代書報社及時出版了林陵的譯作、世界知識出版社又出版該作重譯本，茅盾先後就該劇作及其上演發表了 4 篇文章，完全站在蘇聯立場上解讀美國，認為「《俄羅斯問題》可以幫助我們認識美國，對於我們教育意義很大」，中央戲劇學院話劇團 1950 年排演這個作品（由章泯先生導演），當時中國正在被史達林強行納入朝鮮戰爭，這本來是應該引起中國知識界和高層知識精英所警惕的，可是老舍卻寫下《看了〈俄羅斯問題〉的彩排》，稱「這是一件勇敢的事」，甚至希望導演修正原作（讓女主人公傑茜不是背棄男主人公史密斯而去，而是史密斯如何說服傑茜一同對付「腐臭的美國社會制度」）⁵¹。不僅如此，茅盾在《史達林與文學》中更直接把史達林關於「文藝上的最正確指示」「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視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原則

⁵⁰ 參見《茅盾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第 33 卷，2001 年，第 479-480 頁。

⁵¹ 參見《中蘇友好》，第 2 卷，第 6 期，1950 年 10 月 1 日。

⁵²。進而，提出很多聳人聽聞的主張，諸如「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在文藝方面亦如此」⁵³、「四十年來，蘇聯文學理論家和批評家們的辛勤努力所獲得的巨大成果，給予世界各國進步的文藝工作者以思想武器，加強他們的戰鬥力量，也給予世界各國千千萬萬的文藝工作者以啓發，引導他們走向服務於人類進步事業的道路……蘇聯文學以其輝煌的創作和理論粉碎了一切修正主義者的謬言和誣蔑」⁵⁴、「蘇聯文學把自己的一切創造度貢獻給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文學，他以巨大的藝術力量忠實地反映了蘇聯人民四十多年來走過的光輝道路。人民從這裏可以找到解放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建設自己的新生活的精神力量。正因為如此，我們中國人民對蘇聯文學有著極為深厚的感情，把它當作良師益友……全世界進步的人類都在越來越強烈地愛戴蘇聯文學」⁵⁵。這些情形表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現代中國被剔除了民族性身份，其「人民性」的普遍價值得到了凸現，進而蘇俄新文學中所隱含的新帝國意識形態訴求，和蘇俄文學的審美價值問題一樣，很長時間不被中國所警覺。

可以說，來自蘇俄的馬列主義及其一系列進步文化，在促進了中國革命情勢的同時，也帶來了誤讀俄羅斯的嚴重問題：不嚴肅查考蘇俄馬列主義發生學的民族文化傳統根據及其所生髮出的一系列關鍵性概念，蘇俄社會主義的民族性訴求也在國際共運原則在中國獲得了廣泛的認同。

總之，蘇俄主流文化，尤其是蘇俄馬克思主義，吻合知識界為重建中華民族而成爲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現實性需求，在快捷認識列寧和蘇俄馬克思主義及其文學、文學批評、文學理論過程中，找到了多方面有價值的思想文化資源。但此舉也帶來了一系列嚴重誤讀：誤把蘇俄列寧主義和史達林思想當作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並在國際共運原則下回避了蘇俄馬列主義的俄國文化傳統基礎、民族身份和民族性訴求等問題，進而把蘇俄「民主」、「人民性」、「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等概念當作具有普遍意義的真理，把蘇俄文學和文學理論當

⁵² 參見《人民日報》，1949年12月1日。

⁵³ 茅盾：《蘇聯藝術家的表演給了我們寶貴的啓發》，載《人民日報》1952年11月15日。

⁵⁴ 茅盾：《敬祝蘇聯第三次作家代表大會勝利成功！》，載《世界文學》1959年3月號。

⁵⁵ 茅盾：《在蘇聯第三次作家代表大會上的祝詞》，載《人民日報》1959年5月20日。

作「進步」文學的範本和「革命」理論的標準，而事實上 20 世紀初是帝國普遍崩潰而紛紛代之以民族國家的階段，現代中國知識界應該冷靜辨析真假馬克思主義、正視資本主義問題、建構世界多元文化圖景等，以更合理地配置資源，從而有效地解決中國問題。